

苗地界”。笔者将此称为“内地化边疆”现象，这一现象显然很难用通常而言的“内地/边疆”这种二分法来予以说明或解释。其次，明初朱元璋针对云贵地区发布的上谕中，虽然屡屡使用“中国”一词，但显然其边界限于汉人移民分布地区；进而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元朝廷在制定各藩国朝贡礼仪之际，把云贵等地的土司辖地与日本、朝鲜等同列，统统将其纳入“朝贡”对象中。也就是说，云贵地区在政治上位于行省范围内，毫无疑问是中国的组成部分，在中国的疆域和版图之内；但同时，在文化上又表现出其不同于中原文化的多种形态，因此有关“苗疆”、“生界”、“化外之地”、“边防”之记载所划出的边界，其实都是属于“教化”意义上的表述，反映出“历史中国”概念的多重性及丰富内涵。

晚清以后，在西方民族国家理念的影响下，中华帝国模糊的疆域开始固化为清晰的领土边界，但中国历史上形成的“一体多元”结构仍然被今天的中国所继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体制是现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重要的特征。这种“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共生结构依然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最具生命力的部分，也是近代中国在世界格局的剧烈变迁中仍然维系国家统一的最重要基础。

近代以来，“历史中国”的这种整体性便不断受到西方分析话语的肢解和割裂。在强大的西方话语的影响下，避讳谈“疆”、强调“自古以来”也成为“弱者”抵抗的“武器”。旁观近年来有关“内亚视角”“新清史”的争论，笔者认为：无论研究主体、研究视野、研究史料如何变换，但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本身就是一个世界性体系，中华文化主导东亚文明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学者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可以从多个视角切入进行历史阐释，但如果连既存的事实也否认，用“本部/藩部”等这样一些本来互为一体的概念来切割“历史中国”的整体性，其结论也只不过是“盲人摸象”罢了。

“苗疆”作为一个在特定历史语境中具有特定内涵的地域概念，虽已离我们远去，但其意义并非仅存于故纸堆中。今天的“苗疆”仍被视为中国大地上的一块神奇之地，经由诸多文学艺术作品的描述，散发着异样的芬芳，悄然拨动着我们的心弦。重返“苗疆走廊”，对我们深入理解西南地区各民族“一体多元”共生格局形成的过程，推动地方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论 文】

### 明代“苗疆走廊”的形成与贵州建省<sup>1</sup>

曹端波<sup>2</sup>

摘要：明代贵州建省为中国历史上西南政策的重大转型。明洪武、永乐时期因一条路，即云南入湖广“一线路”，而在贵州建省，极大地改变了西南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明代贵州“一线路”是国家在战国秦汉以来对西南经营的基础上形成的，特别是宋元时期江南、湖广经济中心的确立和云南经济的发展。明代为了构建国家从西北到西南的整体国家防御体系，构筑一条自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通道”，将云南与中南、江南联结起来，这一“通道”经历史演变，形成西南至内地的“苗疆走廊”；不仅西南纳入全国经济圈，也开启了西南非汉族群内地化的进程。

关键词：明代 苗疆走廊 贵州建省

<sup>1</sup> 本文为“贵州大学211三期工程重点课题（项目号：211AMZQ006）”阶段性成果。

<sup>2</sup>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贵州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西南少数民族史研究。



中国历史上最高行政区的建立不仅仅是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使然，还有政治因素在内，即该区域因在国家政治地理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国家为达到政治的稳定而设置管理机构。明洪武十五年（1382），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永乐十一年（1413），设置“贵州布政司”，永乐十二年（1414）设置“贵州按察司”，这样，明帝国在贵州建立了完整的地方最高政区系统：军事化都指挥司系统、民政的布政司系统、按察职能的按察使司系统。明代贵州建省，已有学者论述，但很少从宋元以来，西南政治地理格局的转变和明代西南政策的视角探讨作为西南腹地的“贵州”建省的政治经济原因。本文试图从明代贵州建省的主要原因，为建立一条从“湖广”经“贵州”到“云南”的“通道”而在贵州设立最高地方政区，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西南至内地的“苗疆走廊”，来探讨元明时期贵州在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的变迁。

## 一、

对于“贵州建省”，明清时就有学者、官员进行探讨。明代李化龙在平播时《请罢开矿疏》中指出：“夫贵州何地，此时何时，而尚可为此事乎？盖贵州原非省会，只以通滇一线，因开府立镇，强名曰省。其实皆高山峻岭，军民无几，尚不能当他省一大府，有何名马方物，其谁不知之？彼武弁贫窘无聊，又见各省俱有税使，以为贵州虽称瘠薄，然但得诳奏圣明，奉旨征税，传食万里，逍遥数月。计至彼处，即不如额，且可充囊，此不过为身家之计耳，岂复有一毫为国之心乎？夫使其为往日之贵州也，止于无税而已。”<sup>[1]</sup>（卷1《奏议》）李化龙在奏疏中指出了贵州建省的特殊性，“只以通滇一线”，因此在贵州建省，至于其本身的经济实力还达不到其他省份的府级政区。王士性《广志绎》曾对贵州“一线路”状况给予较准确的描述：“出沅州而西，晃州即贵竹地；顾清浪、镇远、偏桥诸卫旧辖湖省，故犬牙制之。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西南万里滇中，滇自为一国，贵竹线路，初本为滇之门户，后乃开设为省者，非得已也”<sup>[2]</sup>（P324-325, 333）。国家在贵州开辟一条道路，“借一线之路入滇”，其目的在于连通云南和湖南，使云南与中国核心经济区联系起来。郭子章《播平善后事宜疏》对于作为“通道”的贵州说得很清楚：“贵州四面皆夷。中路一线。实滇南出入门户也。”<sup>[3]</sup>（卷419）

贵州为西南腹地，是联结云南与中南，巴蜀与两广的枢纽，其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论述贵州形势时指出：“尝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达于西北，几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胸腹，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至冲，则沅、靖未争也；踞普安、乌撒、以临滇、粤之郊，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拒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固矣。命一军出沾益，以压云南之口，而以一军东指辰、沅，声言而下湖南，而卷甲以趋湖北，武陵、澧阳不知其所守。膺击荆南，垂头襄阳，而天下之腰膂已为吾所制矣！一军北出思、黔，下重庆，敌疑我之驰萌也。问途沔北，顾盼长安，而天下襟吭且为吾所矣！所谓以攻则强矣！”<sup>[4]</sup>（卷11《贵州方舆纪要序》）

贵州作为西南交通枢纽于战国秦汉时期就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战国时期，楚与秦争夺西南地区霸权，楚国将军庄蹻即沿长江水道而上，经贵州进入云南，“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庄王苗裔也。蹻至滇池，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欲归报，会秦击夺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还，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sup>[5]</sup>。庄蹻经黔中郡到达云南，也因秦夺取黔中郡后，“道塞不通”，回不了楚国。汉武帝时，因湖南、江西一带水道太多，阻碍了因不熟悉水战的北方汉人，“今以长沙、豫章往，水道多绝，难行”<sup>[5]</sup>；因此派唐蒙开通巴蜀经贵州至岭南的“古夜郎道”，“窃闻夜郎所有精兵，可得十馀万，浮船牂柯江，出其不意，此制越一奇也。诚以汉之强，巴蜀之饶，通夜郎道，为置吏，易甚”<sup>[5]</sup>。



作为大一统的秦汉帝国，对西南的经营交往积极，但由于云贵川交界地带，特别是贵州，“地无三尺平”，非汉族群复杂，导致国家积极倡导的“官道”流于失败。司马迁对此进行了较详细的记载：“当是时，巴蜀四郡通西南夷道，戍转相饷。数岁，道不通，士罢饿离湿死者甚众；西南夷又数反，发兵兴击，耗费无功。上患之，使公孙弘往视问焉。还对，言其不便。及弘为御史大夫，是时方筑朔方以据河逐胡，弘因数言西南夷害，可且罢，专力事匈奴。”<sup>[5]</sup>汉武帝经营巴蜀经贵州至岭南的“官道”失败了，并不能否认民间商路的存在。由巴蜀经长江水系如赤水河、乌江等进入贵州腹地，再经牂牁江到达番禺的民间商路把贵州纳入全国体系。

民间商路不仅仅沟通巴蜀、两广与贵州的经济，而且影响了贵州的文化和生活。沿此商路发现大量的汉代考古遗址可证巴蜀文化对贵州乃至广西巨大的影响，如黔中一带的安顺、清镇、平坝等地挖掘的汉墓葬品与巴蜀、广州一带相似，“清镇、平坝所出土的土坑墓，其形制与四川巴县冬笋坝出土的汉墓有许多类似的地方。砖墓的结构，较之湖南耒阳花营1号墓和广州、四川等地的同时期墓葬，相同的地方也很多”，“出土的大批方格纹陶器，与广州华桥新村西汉墓出土的大致相同。这种方格纹陶器，主要出土于土坑墓中。铜器中的铜瓶与湖南长沙月亮山汉墓出土的一件相比较，花纹布局是一致的。漆耳杯的铭文，与朝鲜乐浪出土的广汉郡漆耳杯同一体裁。五铢、大泉五十、货泉等都为王莽时期的钱币。更重要的是漆耳杯上的铭文，告诉了我们元始三年的可靠年代”<sup>[6]</sup>；黔西汉墓墓葬形制和结构与清镇、平坝的东汉墓基本相同：砖室墓的几何纹花砖在清镇、平坝和赫章东汉墓中亦有发现，并且极为相似；随葬品中的铜镜，具有典型的东汉风格，这种铜镜以前在清镇23号墓（东汉）中发现过，纹饰是相同的；抚箏俑、扶耳俑无论服饰和形态都与贵州赫章东汉墓、四川牧马山东汉崖墓、洛阳烧沟23号墓的陶俑极为相像；另外铜釜、料耳当、银手镯和戒指之类的器物，也是在清镇、平坝东汉墓中常见的<sup>[7]</sup>。据考古发现，贵州汉墓的分布明显呈线性，如黔西甘棠的汉墓呈东西方向，而南北方向还未发现汉墓遗址<sup>[8]</sup>。

魏晋南北朝时期，西南大姓崛起，形成割据，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卷4“南宁蛮爨瓚窃据宁州”条记载：“梁太清中，宁州刺史徐文盛以勤王征还江陵，东土丧乱，遂不除刺史。武陵王纪据蜀，别用陈智祖为宁州，旋随纪东下。土人爨瓚窃有宁州，遥属于周。惟牂牁谢氏为梁、陈守。梁、陈遂不能有夜郎郡，惟就其侨民置夜郎郡于辰阳。”<sup>[9] (P200-201)</sup>隋文帝时，黔中大姓开始臣服，“隋文帝开皇二年（582），以田宗显为黔中太守，征宁州刺史窦定荣为左武侯大将军，以韦冲为南宁州总管。冲至南宁，渠帅首领皆诣府参谒。三年，爨瓚遣使朝贡，命韦冲以兵戍之。置恭州、协州、昆州，以爨瓚为昆州刺史”<sup>[9] (P218)</sup>。

作为巴蜀经济区南北的贵州，因有水路从巴蜀直达黔中一带，历史上不断有巴蜀移民进入黔中。隋建立政权后，益州总管梁睿请讨南宁，并上疏：“拓土开疆，王者所务。南宁州，汉代群舸之郡，其地饶沃，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则远振威名，二则有益军国。其处与交、广相接，路乃非遥。汉代开此，本为讨越之计。伐陈之日，复是一机，以此商量，决谓须取”<sup>[9] (P217)</sup>。梁睿征讨贵州的理由在于贵州为巴蜀与岭南的交通要道，且这一“通道”上分布有大量汉人，战马也较多，能够为国家增强力量。

唐代，贵州境内大姓臣服者增多，国家在贵州开通了巴蜀至广西的“官道”。唐高祖武德三年（620），牂牁大姓，谢氏入朝，“昆明东九百里，即牂牁国也。牂牁，东距辰州二千四百里，其南千五百里即交州也。无城郭，土热，多霖雨，稻粟再熟。无徭役，战乃屯聚。刻木为契，盗者倍三而偿，杀人者出牛马三十。首领谢氏，至龙羽有兵三万。武德三年，遣使者来朝，以其地为牂州，拜龙羽刺史，封夜郎郡公”<sup>[9] (P234)</sup>。唐贞观时期，黔中大姓入朝者增多，如东谢酋长谢元深、南谢酋长谢强、西赵夷子蛮等。贞观十三年（639），侯弘仁由重庆出发，打通了巴蜀经贵州至广西的通道，“渝州人侯弘仁自牂牁开道，经西赵出邕州，以通交、桂。蛮、俚降者二万八千余户”<sup>[9] (P244)</sup>。

宋代广西买马路也是利用自广西经贵州到云南的传统民间商路为基础，因此，经营广西买马

的西南本土商人多为贵州一带的商人。南宋时期，国家加强了对贵州东部非汉民族区域的经营，其发展路线主要是从长江水系的支流，如乌江、沅水而上，利用河谷地区有利于水稻耕作区进行军屯。嘉定五年（1178），臣僚上言：“辰、沅、靖等州，旧尝募民为弓弩手，给地以耕，俾为世业。边陲获保障之安，州县无转输之费。”<sup>[10]（卷394《蛮夷二》）</sup>正是因为宋在贵州东部的经营，贵州东部镇远等地成为元与宋争夺的重要战场，“十二年（1275），（朱国宝）进兵临岳州，与宋兵战于岳之桃花滩，获其将高世杰，进昭信校尉、管军总管。既降湖右，加宣武将军，统蒙古诸军，镇常德府，知安抚司事。时宋诸郡邑多坚守不下，国宝传檄招谕，逾月悉平，惟辰、沅、靖、镇远未下。宋将李信、李发结武冈洞蛮，分据扼寨，国宝击败之，其众退保飞山、新城。思、播蛮来援，国宝复与战，破之，擒张星、沈举等三百余人。进攻新城，获信、发等，献俘江陵。行省奏功，赐金虎符”<sup>[11]（卷165《朱国宝传》）</sup>。

## 二、

作为西南腹地的贵州，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主要在于“通道”。万历《贵州通志》记载：“黔于《禹贡》为梁州之境，殷为鬼方，周为鬻、微、羌、巢之类，汉为牂牁郡，而迤西稍入犍为，迤南稍入益州，迤东稍入武陵。自汉以来，代多羁靡，未有若我国家收之幅员之内，一视之而树之屏者，此我太祖再造区宇，绍统古先帝王而非求多也。今日之黔，东则楚，西则滇，北则川，南则粤，是腹心而咽喉也。或者不深惟祖宗用变之初意，猥以其地之瘠、道之险而漫言羁靡，空谈干羽，则三旬之师，三年之克，帝王何乐与远夷区区争一顺逆者？可以长思矣。”<sup>[12]（卷1《省会志》）</sup>贵州省级行政区的设置并非是与远夷争一顺逆，而是因为贵州是大西南的“腹心”和“咽喉”。

“贵州”作为地方最高政区的出现是为一条路，即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入滇路”。因一条路而设置地方最高政区以维护之，这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明代为何要一改前代西南政策，要打通贵州“一线路”和设置贵州最高政区呢？这需要从元明时期，中国政治地理格局的变化和国家整体边疆防御体系来说明。对于云南古代的对外交通，有许多学者进行研究和探讨，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但人们对于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一线路”要么忽视，要么没有将此“通道”与贵州建省结合起来，没有从这一条新的“通道”来探讨明代西南政策的转型。

贵州建省是专为“滇”而设，因此，探讨贵州建省，必需从云南对外交通和政治地理格局进行探讨。明代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4“入滇三路”记载：“入滇路有三道：自四川马湖府以至云南府属之嵩明州，又自四川建昌行都司履之会川卫，以至云南武定府，是为北路；自广西之田州府至云南之广南府，由广南之广西府，是为南路；其自湖广常德府入贵州镇远府，以达云南之曲靖府，是为中路，则今日通行之道也。”<sup>[13]（卷24《外郡》）</sup>明代云南与中国内地的“通道”有三条，即入蜀、入桂、入黔三路，作为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中路是明代通行之路，而四川路线和广西路线几乎处于停滞，“蜀中粤西两路，久已荆榛，仕人以至差役不复经由。惟建昌为滇抚所辖，尚有商贾间走此捷径者，亦千百之一耳”<sup>[13]（卷24《外郡》）</sup>。

明代专门依赖贵州“一线路”，史载明确；明清时期很多人已经注意到明代专门依赖“贵州路线”的不合理性，主张改变这一情况。如《万历野获编》记载明代云南举人杨提等上疏，“请辟牂牁故道，由省城竟抵广西田州，由富川以入三江口，便可从大江直抵南都，亦可以陆路竟达常德府。其路较今走贵州者凡近三千余里，且列其便有五”，即主张改走“广西路线”，然而，由于开辟一条新路，不仅要增加大量经费，而且涉及西南政策的格局，“盖贵州本罗施鬼国，特以通滇一线，强名省会，水西安氏，力任邮传，以故声息时闻，不敢狂逞。若黔路一塞，则普安以东，便成荒徼，安氏且据为橐中物矣。即使安氏世守臣节，而四川马湖以西，建昌以南，俱土司错壤，广西之田州亦土官也。其犷悍难制与水西等耳，故谈滇事者，谓不如仍由黔之便”。比较起来，“广西路线”还不如“贵州路线”方便；后来，工科给事王元翰建议多方疏通云南对外“通

道”，“谓云南去京万里，往来仅黔中一丝，滇境西有金沙江，可一苇直达四川之马湖，西有西粤一路，由普安至田州，皆不过添设数驿，涂平水稳，既可以通金陵，又可以出荆襄，亟宜疏辟以广入滇之道，由黔、由粤、由蜀，又水路由江，四途并进，则土司诸夷自失其负固之势，可不烦征剿”，但其结果也是“其疏留中，盖元翰亦滇人，其说亦犹之杨提也。庙堂寝阁，迄今不行”

[13] (卷24《外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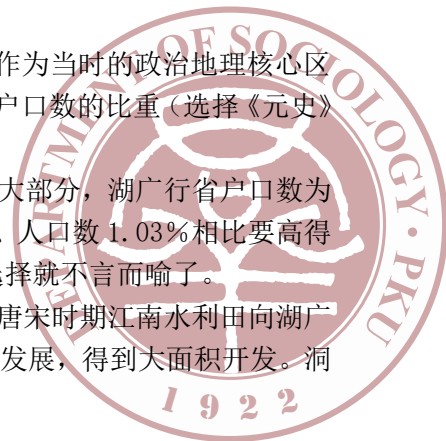
明代由于各种条件和湖广经济区对西南的作用，使云南单一地依靠贵州“一线路”格局难以改变。清代，由于西南交通网络体系更为发达，清代学者注意到其他交通路线的重要性。清代学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对云南形势进行了分析：“云南古蛮瘴之乡，去中原最远。有事天下者，势不能先及于此。然而云南之于天下，非无与于利害之数者也。其地旷远，可耕可牧，鱼盐之饶，甲于南服。石桑之弓，黑水之矢，猺、獠、爨、僰之人，率之以争衡天下，无不可为也。然累世而不一见者，何哉？或曰：云南东出思、黔已数十驿，山川间阻，仓卒不能以自达故也。吾以为云南所以可为者，不在黔而在蜀。亦不在蜀之东南，而在蜀之西北。元人取道泸州，置驿于永宁、赤水之间，盖用蜀之东南。明初取道贵州，置驿于普定、普安之间，则又弃蜀而专事黔矣。大都邮驿之设，以京师为向背，而夺其径易之路，示以画一之途，亦制驭强索者，所有事也。沿袭渐久，遂徇耳目而废其心思。若谓云南要害舍黔中无足计者，是亦不知变也已。明初，规取云南，太祖谕傅友德曰：关索岭路，本非正道。正道又在西北，此亦不专事黔中之一验也。”顾祖禹认为云南对外“通道”需要多元化，特别是加强云南与巴蜀经济区的沟通，认为在加强秦汉时期四川东南与云南“通道”外，还需要重视云南与四川西北的“通道”，这一“通道”能够有效地打通西南与西北各族群的交通，“吾观从古用兵，出没恍惚不可端倪者，无如蒙古忽必烈之灭大理也。自临洮经行山谷二千余里，自金沙江济，降摩荻，入大理，分兵收鄙阨诸部，又入吐蕃，悉降其众。夫从临洮而抵金沙，亦不过二千里，行军于无人之地，更不事假道蜀中也。夫彼可以来，我何不可以往？设有人焉出丽江而北，招纳诸番，结以信义，径上洮岷，直趣秦陇，天下之视听，必且一易，以为此师从天而降也。”<sup>[4]</sup>(卷113《云南方輿纪要序》)

明代云南入黔“一线路”的形成成为元明之际中国政治地理格局所产生，而非明初朱元璋或其后来继任者一时的政策导致。贵州“一线路”萌芽于元代，耶律秃满答认为秦汉以来云南对外传统“通道”因水道险阻，所过道路不畅通，“窃见乌蒙迤北土僚，水道险恶，覆坏船只。黎、雅站道烟瘴生发，所过使臣艰难，人马死损”，因此于至元二十七年(1290)上奏，主张另建云南对外“通道”：“本省南接云南所管普安路见立马站，东建辰、沅、靖州站赤。已尝令总把孟皋直抵云南、湖广两省立站地界，相视得普安路迤东罗殿、贵州、葛龙俱系归附蛮夷，隶属四川省管下，可以安立四站。接连湖广省所辖新添地面，安立一站，至黄平、镇远，通辰、沅、靖州常行站道，以达江陵路。”<sup>[14]</sup>(卷19418)耶律秃满答所建议的“通道”较为成熟，一方面，湖广西部与黔中的“通道”已经存在(南宋时期，国家在贵州东部，特别是舞阳河、清水江通湖南的水道已建立)，并较方便；另一方面，在云南通往湖广西部的黔中族群已归附元帝国，因此建立云南经贵州到湖广的“通道”是可行的。耶律秃满答的主张很快得到中央政府的认可，将云南通普定路与辰、沅、靖州站赤联结起来。

元代需要开辟云南至湖广“通道”，其政治、经济原因在于湖广作为当时的政治地理核心区格局已经形成。如梁方仲所统计元代各省户口数、平均户口数及各省户口数的比重(选择《元史》记载数据)<sup>[15]</sup>(P178)：

根据户口数、人口数，江浙、江西、湖广等三个行省占了全国绝大部分，湖广行省户口数为全国的19.26%、人口数为15.83%，这与四川行省的户口数0.71%、人口数1.03%相比要高得多；因此，联结云南到中国内地的“通道”是进入四川还是湖广的选择就不言而喻了。

湖广地区的崛起，在于宋末战争中所受危害少于四川等地，加上唐宋时期江南水利田向湖广地区推广，原来北方汉族难以进入的湖区、河流沼泽区因水利稻作的发展，得到大面积开发。湖



庭湖湖区自南宋以来，水利田发展很快；元代，国家因江患而参与大型水利的整治：“洞庭北受江流，有虎渡、采穴、景沦、调弦诸口之水，而湖势益雄。然自古不闻江为湖害。自宋南渡之后，国家贫困，以荆南屯留之卒艺种民田，筑江堤，塞穴口，以等兵食，而水道一变，江患遂起。元大德九年，案口开疏，共计 6 处，江南江北分杀江势。”<sup>[16] (卷 46 《建置志》)</sup>湖广行省因水利稻作的扩展，使本区域粮食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成为国家赋税和漕粮的重要来源之一。如大德十一年(1307)中书省因漕粮不继，令江西、湖广各运输 50 万石至北京：“常岁海漕粮百四十五万石，今江浙岁俭，不能如数，请仍旧例，湖广、江西各输五十万石，并由海道达京师。”<sup>[17] (卷 195)</sup>

省别	属县	户数	口数	户均口数	户数诸省比	口数诸省比
诸省总计	1, 110	13, 867, 219	59, 519, 727	4. 47	100. 00	100. 00
中书省	346	1, 355, 344	3, 691, 84	2. 72	9. 77	6. 20
岭北	—	—	—	—	—	—
辽阳	10	84, 756	461, 424	9. 28	0. 61	0. 78
河南江北	182	901, 956	4, 117, 737	4. 47	6. 50	6. 92
陕西	87	89, 839	769, 598	8. 57	0. 65	1. 29
四川	79	98, 538	615, 772	6. 25	0. 71	1. 03
甘肃	—	2, 312	32, 666	11. 62	0. 02	0. 05
云南	47	—	—	—	—	—
江浙	144	6, 326, 428	28, 736, 947	4. 89	45. 62	48. 28
江西	79	2, 337, 191	11, 674, 542	5. 00	16. 85	19. 62
湖广	136	2, 670, 351	9, 419, 625	3. 53	19. 26	15. 83
征东	—	—	—	—	—	—

湖广地区对于西南的地缘优势不仅仅在于湖广地区经济的发展，还在于元初湖广行省西部设立了屯军，已将湖广行省西部建设成为中南、西南非汉族群的治理中心。如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刘国杰在贵州、广西、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继承宋代的治边方略，设置屯军，“辰、澧地接溪洞，宋尝选民立屯，免其徭役，使御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寨兵，宋亡，皆废，国杰悉复其制，班师。继又经画茶陵、衡、郴、道、桂阳，凡广东、江西盗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将士以守之，由是东尽交广，西亘黔中，地周湖广，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诸蛮不能复寇，盗贼遂息”<sup>[11] (卷 162 《刘国杰传》)</sup>。这些屯军主要为南北方向，长达 3000 里，东道广东，西到黔中一带，其国家力量对这些非汉民族渗透之广可以想象。贵州腹地的非汉族群及各政权经由湖广进入中国核心经济区便成为首选，如湖广至元二十九年(1292)，湖广省咨，八番罗殿宣慰司呈的文献可知，当时湖广西部“通道”已经成为西南非汉族群进入中国内地的主要“通道”：“见管地面相接云南交趾溪洞诸国，正系冲要驿路，相离本省往复七千余里，但遇使臣频并，站马不敷。今拟自岳州西抵镇远府，设立水站二十四处”<sup>[14] (卷 19423)</sup>。

### 三、

元代建立了以普安路为基础的云南经贵州至湖广的“通道”后，对以贵州为腹地的西南非汉族群的控制得到加强。在耶律秃满答儿建议修筑云南经贵州至湖广的“通道”前，元帝国军队已经对贵州境内非汉地方政权用兵，为“通道”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如至元十七年(1280)，“以湖南兵万人伐亦奚不薛，亦奚不薛降”，“罗氏鬼国土寇为患，思、播道路不通，发兵千人与洞蛮开道”，并在黔中屯扎军队，“以征也可不薛军千五百复还塔海，戍八番、罗甸”<sup>[11] (卷 11 《世祖本纪》)</sup>。至元二十一年(1284)，当贵州北部、东北部与湖南西部一带非汉族群阻碍“通道”时，李忽兰吉奉旨进讨，并凿山开道，“时思、播以南，施、黔、鼎、澧、辰、沅之界，蛮獠叛服不常，



往往劫掠边民，乃诏四川行省讨之。曲里吉思、惟正一军出黔中，巴八一军出思、播，都元帅脱察一军出澧州，忽兰吉一军自夔门会合。十一月，诸将凿山开道，绵亘千里”<sup>[11]</sup>（卷162《李忽兰吉》）。

元代大德时期，因征讨八百媳妇国，湖广行省远征军即取道“贵州路线”，但由于远征军对贵州境内非汉族群征发过重的赋役，激起贵州土司及民众的反抗，“时刘深将兵由顺元入云南，云南右丞月忽难调民供馈，隆济因给其众曰：官军征发汝等，将尽剪发黥面为兵，身死行阵，妻子为虏。”众惑其言，遂叛”<sup>[11]</sup>（《元史》卷20《成宗本纪》）。贵州土司宋隆济、奢节（蛇节）反抗的主要原因在于湖广行省军队征讨八百媳妇国需要通过贵州，而作为通道的贵州，由于国家没有直接控制该区域，另远征军首领对当地赋役的加重，致使这一“通道”遭到当地族群的封闭。元代对云南对外“通道”沿线的屯田，对于加强国家对交通体系的控制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国家往往对“通道”沿线的屯田较为重视。如乌撒宣慰司军民屯田，“世祖至元二十七年（1290），立乌撒路军屯，以爨焚军一百一十四户屯田。又立东川路民屯，屯户亦系爨焚军人，八十六户，皆自备己业”<sup>[11]</sup>（卷100《屯田》）。乌蒙等处屯田总管府军屯，“仁宗延祐三年（1316），立乌蒙军屯。先是云南行省言：乌蒙乃云南咽喉之地，别无屯戍军马，其地广阔，土脉膏腴，皆有古昔屯田之迹，乞发畏吾儿及新附汉军屯田镇遏。至是从之。为户军五千人，为田一千二百五十顷”<sup>[11]</sup>（卷100《屯田》）。黔中一带，则对普定路屯田较为关注，延祐七年（1320），“立普定路屯田，分乌撒、乌蒙屯田卒二千赴之”。

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在征讨云南方案时就确定从两路进入云南，一路为主力，从湖广的辰、沅一带，经普定路进入云南；另一路则从四川经黔西北进入云南：“上御奉天门，命颖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往征云南。友德等既受命，上谕之曰：云南僻在遐荒，行师之际，当知其山川形势，朕尝览舆图，咨询于众，得其阨塞。取之之计，当自永宁先遣骁将别率一军以向乌撒，大军继自辰、沅以入普定，分据要害，乃进兵曲靖。曲靖，云南之喉襟，彼必并力于此以拒我师，审察形势，出奇取胜正在于此。既下曲靖，三将军以一人提劲兵趋乌撒，应永宁之师。大军直捣云南，彼此牵制，彼疲于奔命，破之必矣。”<sup>[18]</sup>（卷139《太祖洪武实录》）洪武远征云南，即沿袭元代传统进入云南路线，傅友德主力军队即从湖南西部沿贵州路线进入云南东部门户“曲靖”。

从朱元璋对傅友德远征大军的安排可以看出贵州路线的重要性，因此，如何进入贵州，并保证行军路线的安全和后勤保障，为当时明帝国对西南经营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在远征云南前，朱元璋就开始着手经营贵州。如朱元璋于1365年就开始封授贵州东部一带土司，“置思南宣慰使司。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杨琛来归，欲并纳元所授宣慰使告身。上曰：溪洞，乃能识天命率先来归，可嘉也，俾仍为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南等处宣抚使兼新军万户，以三品银印给授之”<sup>[18]</sup>（卷15《太祖洪武实录》）。洪武四年（1372），黔西北、黔中一带彝族土司霁翠归附，在此基础上，朱元璋罢八番顺元宣慰司，设贵州卫，改顺元宣抚司为贵州宣抚司。贵州卫自洪武四年设置后，朱元璋在贵州，特别是在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通道”上建立了一系列卫所，由此，贵州进入设立归顺国家的土司和建立国家直接管辖的军管区“卫所”的时期。

洪武五年（1372），在贵州境内设置贵州、播州宣慰使，“贵州宣慰领长官司七：水东、中曹、龙里、白纳、底寨、乖西、养龙坑。播州宣慰领安抚司二：草塘、黄平；长官司六：播州、余庆、白泥、容山、真州、重安”；并着力经营贵州中西部，为打通云南通道做好准备，“普定府女总管适尔及其弟阿瓮来朝，遂命适尔为知府，许世袭。安顺领州三：镇宁、永宁、普定；长官司六：宁谷寨、西堡、十二营、糜佐、募役、顶营”<sup>[9]</sup>（卷8，P9、15）。洪武八年，调成都后卫指挥佥事顾成守贵州，并在卫所修筑坚固的城池，“乃以卫指挥佥事顾成筑城以守，赋税听自输纳”<sup>[19]</sup>（卷316《贵州土司传》），对叛服不常的非汉族群进行征讨，“顾成调守贵州时，贵州群蛮叛服不常，成连岁出兵讨平之”；因此顾成有“顾老虎”之称，“贵州蛮叛，成连用兵破瓮蓬、瓮底、洪边、乖西等寨，斩获无算，降土贼王万全，而贼首龙小恩走死，蛮人慑服，目成为‘顾老虎’”<sup>[9]</sup>（卷8，P19-20）。

洪武十四年（1381）九月，傅友德远征云南大军从“贵州”、“乌撒”两路征讨云南，十二月，

傅友德主力大军进入湖广，作为主力大军的先锋指挥金事顾成很快平定普定、普安，并于洪武十五年（1382）正月设置贵州都指挥使司，“置贵州都指挥司，治贵州宣慰司，以顾成为使，其有司仍属湖广、四川、云南三布政使司”<sup>[9]</sup>（卷8，P26页）。贵州都指挥使司的设立，主要在于保障征云南大军的后方安全，保障远征军后勤供应基地湖广至云南“通道”的畅通。天启《滇志》卷4陆路列出了三条云南通川贵的道路，即“普安入黔旧路”“乌蒙入蜀旧路”、“建昌路”，其中前两条道路须经贵州都司诸卫所。普安入黔旧路的基本路线为昆明—平夷—普安州—安南卫—盘江—关索岭—安庄卫—普定—平坝—威清卫—贵州—龙里卫—新添卫—平越卫—清平卫—兴隆卫—偏桥卫—镇远府—清浪卫—平溪卫—沅州，即湖广至云南的道路，贵州都司的大部分卫所都分布在这一条线上。西北永宁、乌撒、赤水、毕节、七星关诸卫所分布在乌蒙入蜀旧路上，基本路线为昆明—霁益州—可度—乌撒卫—瓦店—黑张—周泥—七星关—毕节—层台卫—赤水卫—摩尼卫—普市所—永宁卫—永安—江门。这两条线路要经过除黄平等所外贵州都司绝大部分的卫所<sup>[20]</sup>（P495）。

朱元璋在平定云南前，鉴于贵州政治地理的重要性，设置了贵州都指挥使司，但贵州直到永乐时才设置布政司。贵州布政司的设立是永乐十一年（1413）在废除以黔东田氏土司的基础上建立的，“思南、思州相仇杀，始命成以兵五万执之，送京师。乃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贵州布政使司，而以长官司七十五分隶焉，属户部。置贵州都指挥使，领十八卫，而以长官司七隶焉，属兵部。府以下参用土官。其土官之朝贡符信属礼部，承袭属吏部，领土兵者属兵部。其后府并为六，州并为四，长官司或分或合，厘革不一。其地西接滇、蜀，东连荆、粤”<sup>[19]</sup>（卷316《贵州土司传》）。贵州布政司设置之初，管辖区域较小，“分田氏地为思南、思州、铜仁、石阡，镇远、黎平、乌罗、新化八府，遂定设贵州布政司，以蒋延瓚为布政使，而以贵州宣慰司、金筑安抚司及新置八府属焉”；其权力也极为有限，“贵州开省在永乐十一年。田氏就擒，以思南三宣慰司地方改设六府，每府所属不过三四长官司，每长官司人民不过一二百户，官多民少。其地山峭地瘦，夷情猾诈，分隶川湖云南，壤地联络，冲胸掣肘”<sup>[9]</sup>（卷8，P69）。永乐十二年（1414），设贵州按察司，因而在贵州设置了完善的地方最高行政机构，“贵州，古彝蔡域，秦汉来羁縻而已，或稍稍郡县，终不能约束之就法度。皇明有天下，武功文教，无远弗及。洪武初，即贵州立都司，统军卫暨诸蛮长，永乐癸巳遂建布政司，悉州郡其地，间以宣慰、宣抚主之。越十八年庚子，乃设按察司以掌风纪，置按察司副使金事五员，分巡贵宁、安平，新镇，思仁四道”<sup>[9]</sup>（卷8，P69页）。

明代在贵州建省，主要在于贵州在西南交通体系中的地理位置，是沟通西南经济区与中南经济区、江南经济区的纽带。贵州在元明以前属于巴蜀经济区，从交通上也与巴蜀经济中心成都较为方便；元明之际，形成了巴蜀至贵州、湖广至贵州的两条交通线。如洪武四年（1371），负责西南军务的李文忠上奏：“贵州今隶湖广，而其地在成都西南，计成都水路至重庆三十六驿，重庆陆路至播南九驿，播南陆路至贵州五驿，凡五十驿。贵州由播南、思州界至沅州以达辰溪二十一驿，辰溪至湖广一十六驿，凡三十七驿，比之成都至贵州水路少三十驿，陆路少七驿；如遇发兵，自成都至重庆虽三十六驿，然顺流而下，舟行捷疾，以及贵州陆路止一十四驿，若湖广至辰溪一十六驿，辰溪至贵州二十一驿，皆诉上流，驿虽少而路远于成都矣。今议以贵州卫属成都都卫，便于节制；而凡军务之急者，贵州一移文成都都卫，一移文武昌都卫。若民职有司护属湖广行省为便。诏可之。”<sup>[18]</sup>（卷70《太祖洪武实录》）从李文忠奏疏可知，成都至贵州比武昌至贵州方便，因为武昌至贵州沿逆流而上；同理，贵州至武昌肯定比贵州至成都要方便的多。贵州在元明之际，其归属一直摇摆于四川和湖广、或者云南之间，皆在于贵州至周边区域的不便，这种不便至明前期，由于西南战略地位的重要性，在贵州设立单独的地方最高行政系统显得必要，从而使“贵州”进入全国十三布政司之列。

#### 四、





明代洪武、永乐时期，因贵州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西南在国家整体国防体系中战略地位的提高，使湖广经贵州至云南的“一线路”成为经营西南的关键。《明史·贵州土司》记载：“其地西接滇、蜀，东连荆、粤。太祖于《平滇诏书》言：‘霭翠辈不尽服之，虽有云南不能守也’，则志已在黔，至成祖遂成之”<sup>[19]</sup>（卷316《贵州土司传》）。贵州省成立之初，在经济上无法独立，需要依靠邻省供应；之所以建省，只是因为贵州“一线路”的重要性。郭子章《黔记·止榷志》记载：“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淳，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全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从古不入版图。我朝但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线之外，悉皆夷峒。”<sup>[21]</sup>（卷13《止榷志上》）王士性《广志绎》也说，“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sup>[2]</sup>（P325）。可见，尽管贵州建省已200多年，国家对贵州的直接控制和经济文化影响几乎还是在“一线路”及“一线路”周围；也可以看出，明代对贵州的经营重点也是在这一条“官道”上。

明代在贵州“一线路”上设置卫所、驿站等，其主要功能在于保护和维系“一线路”和国家“通道”。据万历《贵州通志》记载，贵州“一线路”驿站所应付的赋役，主要是为云南入湖广的花费：“据贵州按察司驿传道呈称：查得贵州驿站，万历七年（1579）自正月日起至十二月终止，应付过云南马二千八十八匹，夫二千七百三十一名，本省止用过马一千三百三十七匹，夫一千三百九十一名。以十分为率，在云南用过七分，在贵州止及三分。至于上六卫、西四卫各驿站不下数千，尽皆云南过客，而本省之用，则十无一二。是驿站答应，本省有限，应递云南甚繁。矧各贫军代民养马，累及借贷，贻害身家。卫、所、站、堡军夫，数不满百，朝夕杠抬，肩无息期。随查平溪、清浪、镇远、偏桥四卫，所、站、堡虽隶湖广，所辖实在贵州境内，一应由贵入滇者，此为门户，该卫站应付，络绎相寻，较其苦楚之状，实与贵州相同”<sup>[12]</sup>（卷19《经略志一》）。

明代以经营“一线路”为主，国家对贵州的影响也主要在一线路及其周边区域，如明代卫所设置所形成的沿一线路分布的“屯堡”和城市，在贵州境内形成一条带状，自东向西延伸。但随着卫所军屯的展开，内地汉移民开始沿交通线进入贵州，如嘉靖《贵州通志·户口》记载：“贵州四面皆蛮夷，所可知者，各府若卫军民之数甚寥落也。蜀中江右之民侨寓于此者甚众，买添宅长子孙者益多有之。”<sup>[22]</sup>（卷3《户口》）贵州至嘉靖时民户人口与军户人数数已经相差不多，“司府州卫所军民人户一十四万八千九百五十七户，五十一万二千二百八十九丁口；军户六万二千二百七十三户，二十六万一千八百六十九丁口，民户五万六千六百八十四户，二十五万四百二十丁口”<sup>[22]</sup>（卷3《户口》）。在风俗方面，则汉族移民与本土居民互相影响，如万历《贵州通志》记载宣慰司，“本州隶籍人民，多来自中州，风声气习，一如中华”，并在城市周围形成集市，“贸易以十二支所肖为场，附郭兔、猴、鼠、马四场”<sup>[12]</sup>（卷4《宣慰司》），这些集市也将周边非汉族群吸引进来，自然加强了文化、经济的交流。思南府朗溪司的土著由于长期与汉族交往，习俗开始与汉族相似，“曰峒人者，多以苗为姓，皆前代避兵流民，以猎为业，近亦颇类汉人”<sup>[12]</sup>（卷16《思南府》）。

明代贵州建省在于路，由于路导致明代国家对西南腹地的非汉族群实行从控制到治理的变革。明政府在与西南非汉族群打交道的过程中，意识到，单纯地靠武力征服形式是难以保障道路安全的，何况因贵州山地造成的驿道艰难，如果没有当地非汉族群的参与维系，贵州“一线路”上沉重的负担，卫所军民不可能承担的起。西南非汉族群也因族群之间的争夺，需要稳定的公共秩序，尽管国家在一些情况下因赋役而盘剥民众，但具有良知的官员知识分子还是为当地社会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如万历时贵州巡抚江东之《建湖广天柱县疏》中就指出当地苗侗之间因互相仇杀，加上卫有贪官，县有贪民，残害土著民族，因此苗侗汉等民众都有建县的需求，“峒民素不甘心，日望建县更切于苗也”，当地官员朱朱梓获得当地非汉族群的拥护，“诸苗慕之如慈母，畏之如神君，令之即行，禁之即止，虽有一二奸徒阻挠之谋愈巧，百于苗裔归附之诚愈坚。闻职复来，相率迎于三百里之外”<sup>[12]</sup>（卷19《经略志一》）。

贵州的建省是明代在战国秦汉以来，特别是元代西南经营的基础上进行的。贵州作为西南对

外“通道”，很早就已经出现，汉武帝第一次将“通道”纳入国家控制之下，但由于国力有限，国家逐渐退出贵州，将直接控制改为羁縻。隋唐时期，国家重新进入西南，并打通了从北到南的“通道”。元代云南经济得到发展，中南的湖广行省成为当时核心经济区，打通云南到湖广的自西到东的“通道”成为时代之所需，元代第一次将贵州东西“通道”打通。明代朱元璋继承元代西南政策，不仅打通了湖广经贵州至云南“通道”，而且还专门设立贵州省以保护这一条路。这一通道不仅成为国家力量渗入西南非汉族群的“通道”，也是西南与内地沟通的“民族走廊”，即“苗疆走廊”。西南地区也因这一条路而发生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文化的转型，不仅出现了南方汉移民自东向西的大迁徙，而且西南边疆出现了内地化进程，影响中国历史甚巨。

#### 参考文献:

- [1]李化龙,《平播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2]王士性,《五岳游草·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2006.
- [3]陈子龙,《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97.
- [4]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05.
- [5]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版.
- [6]贵州省博物馆,“贵州清镇平坝汉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1).
- [7]贵州省博物馆,“贵州黔西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2(11).
- [8]唐文元,“黔西甘棠汉墓群”,《贵州文物》1982(1).
- [9]任可澄等,《民国贵州通志·前事志》,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
- [10]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1]宋濂,《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
- [12]许一德等,《(万历)贵州通志》,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
- [13]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
- [14]解缙,《永乐大典》,北京:中华书局,1982.
- [15]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 [16]李瀚章等,《(光绪)湖南通志》,长沙:岳麓书社,2009.
- [17]毕沅,《续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8]《明实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19]张廷玉,《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0]郭红,靳润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明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 [21]郭子章,《黔记》,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
- [22]谢东山、张道,《(嘉靖)贵州通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 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 民族社会学专业委员会

本期责任编辑: 马戎、王娟  
邮编: 100871  
电子邮件: marong@pku.edu.cn

